

跨文化的親子互動經驗研究：以一個 育有青少年子女的臺印跨國婚姻家庭為例*

陳翊薇

王翊涵**

玄奘大學學生輔導中心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東南亞跨國婚姻家庭的親子教養一直是學界與實務服務的焦點，隨著子女進入青春期，這些家庭的親子互動更需被多加探討。本文探究東南亞跨國婚姻家庭中父母與國中生子女之親子互動經驗，採個案研究法，並以一個臺印跨國婚姻家庭為例。研究結果首先呈現子女步入青春期後的教養轉變、「父主經濟、母主照顧」的親職分工，以及隨子女接受學校教育，新住民母親與青少年子女的中文能力落差影響母親之親職權能。論及共親職經驗，可見新住民母親雖作為主要教養者，但為能促進臺籍父親與子女互動，加上父權意識型態與先生是家中經濟來源者的影響，母親會積極把先生拉進教養同盟，並在重要教養決策事件傾向「以夫為尊」。最後在親子互動的跨文化經驗中，當新住民母親擬教授子女印尼語時曾受到隱微壓抑，然隨著相關契機出現，母親的母國文化能逐漸具現在親子互動上。基於上述，本文發現在形成共親職共識、雙親積極行動與相互配合及家庭成員善用跨文化的相近性並接納差異性等條件支持下，東南亞跨國婚姻家庭可形成正向動力系統，助益親子互動；另，受性別文化、家計維持角色及在地教育體制優勢等影響，新住民母親雖是主要教養者，然臺籍父親是教養決策者與生涯諮詢者，此在子女步入青春期後更為明顯。本文最後依研究結果對諮商實務與未來研究提出建議。

關鍵詞：青少年子女、東南亞跨國婚姻家庭、新住民、臺印跨國婚姻、親子互動經驗。

* 本文改寫自第一作者的學位論文。非常感謝審查委員與主編群提供的寶貴意見，使本文的內容更臻完善。

** 通訊作者：王翊涵，email: evawang@cc.ncue.edu.tw。

DOI: 10.53106/172851862022010063001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截至2020年4月底，在臺新住民人數已達19萬2380人（不含中國大陸及港澳地區），主要來自越南、印尼、泰國、菲律賓與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且以女性居多（內政部移民署，2020）。隨著東南亞跨國婚姻的增加與發展，家有青少年子女的家庭數量亦明顯提升，從近十年全國國中生人數來看，新住民子女人數所佔比例從1.76%上升至11.04%（教育部，2019）。相關文獻指出，子女教養為東南亞跨國婚姻家庭相當重視的議題（吳欣璇、金瑞芝，2011；曾美嘉，2006），在諮商實務上，與青少年子女的互動是東南亞新住民案主的主訴議題之一（江守峻等人，2017），然當前諮商專業訓練仍缺乏對此議題的了解，故探討育有青少年子女之東南亞跨國婚姻家庭親子互動經驗便有其重要性。

以實徵研究的數量觀之，國內不乏東南亞跨國婚姻家庭的相關研究，其中與親子互動有關者多以新住民母親為研究主體（吳欣璇、金瑞芝，2011；吳瓊洳、蔡明昌，2014；馮涵棣、梁綺涵，2008；黃淑榕等人，2010；黃淑玲，2008；Wang, 2010），部分從臺籍父親的觀點切入（汪慧玲、沈佳生，2014；胡瑞芬，2011；曾美嘉，2006；魏佩君、陳芳茹，2014），少數從學齡兒童視角探究（曾素秋，2009；蔡秋雄，2010），意即既有研究多聚焦在家有幼兒或國小學童者，且多以母親、父親或兒童的單一主體來進行，針對子女進入國中階段之親子互動研究仍屬少數。但如同McGoldrick等人（2014）所指，當子女進入青少年時期，整個家庭將面臨新的發展任務，如面對青少年子女逐漸成熟自主，家庭成員彼此間需重新調整親子關係。而跨國婚姻家庭有其特定的家庭文化脈絡，雙文化特性將影響教養子女的實踐（吳瓊洳、蔡明昌，2014；Bhugun, 2019），加上不同家庭生命週期有不同的教養需求，故需要對育有青少年子女的跨國婚姻家庭親子互動經驗加以探討。綜觀既有文獻，僅有鄧蔭萍（2016）分析新住民女性自嫁入臺灣到孩子進入青少年時期之母職挑戰；黃淑玲（2008）則探討新住民母親面對青少年子女的母職經驗；黃勝美（2013）探究國中子女覺知的家人關係；趙梅櫻（2011）則同時將東南亞新住民母親與國中子女共同納入訪談，從雙方觀點了解親子互動情形。上述研究能助益了解新住民母親對青少年子女的母職教養經驗，但尚缺乏將同一跨國婚姻家庭之雙親與子代成員納入研究，以能整體理解親子互動經驗。

由於本文擬從家庭系統的觀點探究東南亞跨國婚姻家庭的親子互動經驗，因此有機會關注「共親職」(coparenting)在跨文化家庭的運作。共親職意指雙親對於家事、教養子女等工作相互溝通、形成共識與分工之過程(張智嵐, 2019)，此概念因著家庭系統觀點的興起漸受重視，相關研究指出共親職影響家庭安全感營造及親子親密度建立，如McHale與Irace (2011)論證出支持性共親職型態的父母較能以合作、關懷及溫暖的方式和子女互動，易連繫親子情感與維持關係界線的平衡；林雅萍與林惠雅(2009)則發現在沉默的共親職行動中，沉默者和孩子之間可能形成同盟關係。是故探究東南亞跨國婚姻家庭的親子互動經驗也應納入臺籍配偶與新住民配偶之間的共親職行為，以能較全面地掌握跨文化家庭之親子互動樣貌。目前僅有魏佩君與陳芳茹(2014)的部分研究結果談及臺越跨國婚姻家庭父母之共同管教情況，顯示跨國婚姻家庭共親職的研究尚需更多實證資料的累積。

當前以育有青少年子女之跨國婚姻家庭親子互動為主題的研究仍是少數，本文可豐富此議題的學術成果，此為貢獻之一。再者從系統觀點觀之，家庭就是一個系統，在此有組織的整體內，成員之間會產生連續、互動及特定模式的關係(Goldenberg et al., 2017)，本文以一個東南亞跨國婚姻家庭為例，同時涵納父母與國中生子女的親子教養及共親職文本，試圖從家庭整體來呈現摻融不同文化的家庭所繪製出的親子互動樣貌，期能提供不同視角的跨文化家庭教養與共親職圖像，此為貢獻之二。最後，生態系統取向解析了家庭運作常受社會環境的影響並會與外在系統產生雙向的連結(許育光, 2020)，而東南亞跨國婚姻家庭在臺灣社會中面對特殊的政治經濟(夏曉鵬, 2000)、社會階級(王宏仁, 2001)、性別權力(田晶瑩、王宏仁, 2006；潘淑滿、楊榮宗, 2013)等脈絡處境，本文亦擬呈現如此的外在系統如何影響跨國婚姻家庭的親子互動，此為貢獻之三。

綜合上述，本文以一個東南亞跨國婚姻家庭為例，涵納臺籍父親、新住民母親與青少年子女的角度探討親子互動經驗，研究問題為：(1)此家庭對青少年子女的教養經驗為何？(2)雙親之共親職經驗為何？(3)親子互動之跨文化經驗為何？本文藉由同個家庭裡親代與子代觀點的多元對照，爬梳互動事件、角色及家庭成員對互動經驗的認知感受，並試圖考察外在環境系統如何影響這些經驗的生成，研究結果可提升諮商實務工作者對跨國婚姻家庭在親子互動上的專業知能與文化敏感度，並能貼近來談者(特別是新住民家長)的需求。

二、文獻檢閱

為呈現本文論述基礎，以下先說明生態系統觀點與跨國婚姻家庭親子互動議題的關連，再彙整東南亞跨國婚姻家庭親子互動之相關研究。

(一) 從生態系統觀點探討跨國婚姻家庭親子互動

1. 家庭是一個系統

親子互動為連續相互影響、循環的歷程，涵蓋心理、身體及語言的互動（汪慧玲、沈佳生，2014）。前已提及家庭是一個系統，任一部份的變動將會連帶影響其他部份。相關文獻指出，當子女進入青春期的階段會面臨子女逐漸成熟、親子關係的再調整等議題（McGoldrick et al., 2014）。由於青少年子女開始追求獨立自主、家長權威性降低，且同儕及家庭以外人員的影響力逐漸高於家長，使雙親感受到與子女的疏離，因而試著積極建立關係、並以尊重的態度與子女協商互動（高淑清、廖昭銘，2004；Collins & Laursen, 2004）。日常的口角爭執與家長的高壓控制亦是此階段親子互動的普遍特徵，青少年子女在衝突中表現出憤怒情緒，然因相對權力不對等，其難以爭取到想要的結果（Adams & Laursen, 2001）。

跨文化家庭為不同文化背景（如種族、宗教、國籍）的伴侶所共組之家庭（Bhugun, 2019），相較於文化相近家庭，跨文化家庭系統面臨的獨特挑戰為價值觀、規則與權力的文化差異（Ruebelt et al., 2016）。Bhugun（2017）指出語言溝通、對家庭內其他成員的角色定位、不同文化的教養理念等，將是跨文化家庭親子互動易產生衝突的主因，並反應在雙親對孩子的紀律養成、社會化歷程、角色要求等方面；面對這些教養衝突，不同文化背景的雙親會透過溝通、妥協來因應，或按雙親角色分配教養任務，然擁有較多權力的一方通常為決策者，另一方僅能放棄原先的文化價值、順從對方的文化規範。但Crippen與Brew（2007）指出，跨文化家庭會因著文化多元特性產生韌性，在衝突、調適、相互涵化的過程中揉合出新的價值並傳遞給子女，在問題解決上呈現多樣性。此外跨文化家庭的子女在雙親不同文化的薰陶下，易培養寬廣的世界觀，並有較佳的文化敏感度及同理心（Bhugun, 2019）。

由上可知，當子女步入青春期的階段，家庭系統隨之變動，雙親教養將衍生新的挑戰，而跨國婚姻家庭可能又因文化差異、親職權力、角色分配等影響產生更大的衝擊，然既有文獻亦提醒跨文化家庭能夠展現出韌性。基於此系統觀點，本文呈現一個育有青少年子女之東南亞跨國婚姻家庭內所有成員的親子互動文本，以能在家庭整體的視角下綜整出跨文化的親子互動經驗，檢視臺籍父親、新住民母親及青少年子女如何建構

親子互動圖像。

2. 東南亞跨國婚姻家庭的形成脈絡與處境

生態系統論學者Bronfenbrenner提出四個生態系統：微系統（microsystem），為個體與父母、手足或學校同學間的人際連結；中系統（mesosystem），為兩個微系統之間對個體造成的影響；外在系統（exosystem），對微系統的運作發揮重要支柱，如職場、學校、社區；大系統（macrosystem），為對個體造成影響的重要社會文化影響，如性別角色、社會價值等（引自許育光，2020）。而根據Peterson與Hann（1999），生態系統觀點不僅視家庭為一個整體，亦認為親子互動應置於社會文化脈絡下探討，始能理解社會脈絡與家庭間的交互作用。意即理解親子互動，不僅只著重於家庭此一微系統內，中系統、外在系統與大系統之影響亦需關注，故以下將爬梳東南亞跨國婚姻家庭的形成脈絡與處境，以作為本文生態系統觀點的分析基礎。

探究臺灣與東南亞間的跨國婚姻形成，夏曉鵬（2000）指出因全球化造成的國際資本分佈不均，使得位於邊陲國家的女性透過商品化的仲介運作，以跨國婚姻流動至較高度發展國家；加上資本主義發展帶來的社會階層化，致使本地婚配市場處於弱勢的男性需前往低度發展國家謀求婚配對象（王宏仁，2001）。過程中仲介扮演重要角色，不僅讓跨國婚姻與商品化結合，其亦試圖營造東南亞國家女性之傳統婦德形象，迎合臺灣男性對於「理想妻子」的既定想像，形塑出此類家庭順應男尊女卑的性別規範（田晶瑩、王宏仁，2006）。簡言之，臺灣與東南亞國家的跨國婚姻形成交織著全球化所衍生的國與國間階級關係、商品化特徵及性別權力的影響，這也使得此類家庭易承受來自社會的污名與偏見（王翊涵，2012；朱柔若、孫碧霞，2010），並需面對獨有處境。

由於多數跨國婚姻為速成婚配，致使夫妻雙方或家庭成員在婚姻初期，在語言、飲食、風俗、宗教等方面需要花費更多時間來進行磨合（蕭昭娟，2000）。而媒體多呈現對新住民女性的貶抑報導，因此夫家對外籍媳婦多不信任（王翊涵，2012），加上娘家遠在天邊，新住民女性的社會支持系統較為限縮（許雅惠，2009），甚至部分夫家有歧視、壓抑新住民女性母國文化的情形（朱柔若、孫碧霞，2010），然新住民女性能在適應歷程中展現主體性，逐漸營造穩定生活（王翊涵，2011；陳志賢，2016）。隨著子女出生，跨國婚姻家庭開始面臨經濟與親職教養議題，如詹火生與陳芬苓（2014）發現部份家庭因有沉重的經濟壓力，雙親皆須投入職場而較無心力教養子女。再看親職分工，多數新住民母親是主要教養者，但因語言隔閡及文化差異，其

對自身的教養方式感到信心不足（張雪君、劉由貴，2010）；臺灣父親則常因工作影響了自身與子女的相處，對於教養顯得消極，且親職參與度不高（汪慧玲、沈佳生，2014）。

綜上，因著東南亞跨國婚姻的特殊形成脈絡，教養議題在此類家庭中可能成為挑戰議題之一，臺灣學界也因此累積了相關研究，彙整於下段。

（二）東南亞跨國婚姻家庭親子互動之相關論述

本文檢視既有研究成果，依新住民母親、臺籍父親、雙親及新住民子女觀點進行彙整。

1. 新住民母親觀點

此類研究主要關注新住民母親的母職教養經驗或功能。隨著孩子出生，新住民母親得以緩解在異地生活的孤單，透過把心力投注於孩子身上，找到生存意義與價值（Wang, 2010）。在教養幼兒與學齡前子女方面，新住民母親受到原生家庭及母國文化影響，扮演嚴母角色、重視子女人品及孝順的美德，且希望子女能認識自己母國文化，但若夫妻間有教養衝突時，則以先生或夫家的價值觀為主（黃淑榕等人，2010）。吳欣璇與金瑞芝（2011）的研究顯示新住民母親需要面對與公婆間的世代差異，其又處於家庭結構中的弱勢位置，易阻礙自己與子女發展親子關係。然而新住民母親們即便遭逢母職困境仍能展現主體性，將蘊含母國文化的教養方式來與子女互動，間接實踐文化傳遞（馮涵棣、梁綺涵，2008）。

當孩子進入青少年期，顯現出自主、重視同儕與學業的需求，母子互動因而有所變化。黃淑玲（2008）發現，新住民母親礙於經濟因素與自身能力，無暇陪伴與協助子女課業，且面對孩子的自主意識增強，管教更顯困難，然其試著以傾聽、信任、關心與說理等方式與子女溝通，顯現教養方式的轉變與因應。鄧蔭萍（2016）則發現新住民母親與青少年子女的互動從強制管教轉為夥伴關係，並促使子女間相互教導，讓子女也成為自己的學習助手。綜合上述，可知當子女步入青春後，新住民母親在親職實踐上將感受更多挑戰，必須調整心態與管教方式，以夥伴關係來與子女互動，並在子女的手足關係上引領出較多的相互指導角色。

2. 臺籍父親觀點

在東南亞跨國婚姻家庭中，臺籍父親通常為經濟來源者，易因工作壓縮親子互動時間與頻率（汪慧玲、沈佳生，2014）。這些父親普遍認為男性應擔負較多家庭經濟的責任，並視妻子為家庭照顧者（胡瑞芬，2011），反映出在「男主外、女主內」的

傳統親職分工下，父親參與親子互動的低落。

以互動內涵來看，目前尚無臺籍父親與青少年子女互動之研究，多數研究仍聚焦在父親與嬰幼兒及學齡子女的互動經驗，結果顯示臺籍父親不諳嬰幼兒照護，多由妻子擔負養育責任，自身則擔任從旁協助的角色（魏佩君、陳芳茹，2014）；或是當孩子進入學齡階段，父親與子女的互動主要聚焦在生活照顧、生活常規教導、出遊與課業指導等，且由於妻子有限的中文識字能力，臺籍父親在孩子進入小學後需承接課業教導的責任（胡瑞芬，2011；曾美嘉，2006；魏佩君、陳芳茹，2014）。

3. 雙親觀點

張智嵐（2019）指出關於東南亞跨國婚姻家庭的論述多聚焦在母親因文化不利所產生的教養困境，較少從父方親職功能來理解對子女發展之影響，故呼籲需從共親職角度探究教養與家事分工中溝通、形成共識的歷程。不過探究跨國婚姻家庭共親職的研究並不多，僅有魏佩君與陳芳茹（2014）從臺籍父親的觀點呈現臺越跨國婚姻家庭父母共同管教的經驗，指出在孩子學齡前階段，父母雙方因文化差異致使在管教上時有衝突，如父親的嚴厲與母親相對寵愛孩子的教養態度落差，而隨著子女進入小學，父母分別持續扮演黑臉及白臉的角色，形成互補的管教形式，但父親仍期待教養分工有所調整，如無法接受妻子對孩子過度放任的溺愛態度，及期望妻子照顧子女起居即可的心情。此研究進而點出受到經濟、父權思想與妻子原生文化等影響，臺籍父親在子女學齡前到就學後需轉變不同的父職角色：子女學齡前階段，臺籍父親是輔助越籍妻子的親職角色，提供經濟支持與品德教養；當子女進入學齡階段，臺籍父親則轉變為主要教養者，不僅提供經濟支持，亦提供子女學習指導。

由此可知，東南亞跨國婚姻家庭之共親職確實影響親子互動，且共親職將因著子女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而有不同模式。上述研究以育有學齡子女之臺籍父親為研究對象、探討焦點以父職為主，本文在共親職的研究則以家有青少年子女的跨國婚姻家庭所有成員為研究主體，應能豐厚此類家庭在共親職實作的實徵成果。

4. 新住民子女觀點

蔡秋雄（2010）曾訪談4位就讀國小四到六年級的新住民子女，指出他們共同面對父職缺席、母職乏力及其他家庭成員的驅使下，皆有著把家撐起來的想法，展現親職化行為。曾素秋（2009）則從17位就讀國小之新住民子女的視角，呈現出東南亞跨國婚姻家庭即便經歷經濟與文化的雙重弱勢，仍能積極投入親子關係，展現韌性而非弱勢的親職樣態，子女也能感受到父母的關愛。黃勝美（2013）探究東南亞跨國婚姻

家庭中青少年子女所覺知的父母共親職，發現在父母共親職之支持合作向度上，對母親原生文化有所了解的青少年之人數是多的，且從訪談結果得知，青少年是否了解母親母國文化將受到父親態度的影響，由此可知臺灣先生對於配偶原生文化的尊重與否將會影響夫妻二人的共親職實踐。

從新住民子女觀點來看跨國婚姻家庭的親子互動，既有研究指出這些子女在父母親職功能顯得薄弱或家庭處於弱勢時，可能出現親職化，亦可能展現復原力，而臺籍父親在新住民母親能否將原生母國文化置入親子教養中，具有關鍵性的影響。

綜合上述，多數研究從單一主體（親代或子代）探究跨國婚姻家庭的親子互動，針對雙親與青少年子女之親子互動的研究甚少。趙梅櫻（2011）曾邀請6組家庭之新住民母親與青少年子女共同參與研究，從行為、情感、認知與學習生活層面來理解母子互動經驗，結果顯示青少年子女逐漸忙碌於學業，並傾向將情感依賴轉移到同儕，而母親因忙於家務與工作，和子女的互動時間減少，部分子女使用中文能翻轉被教養者的角色，並呈現親職化特性。此研究同時呈現新住民母親與青少年子女的聲音，產出不同於單一視角的親子互動圖像，看見母子間分離與依戀的拉鋸，可惜缺少臺籍父親觀點的對照。立基於此類實徵研究的缺乏，本文同時涵納一個育有青少年子女之跨國婚姻家庭所有成員，從父母與子女的觀點呈現多元對照的互動脈絡，期能給予諮商實務工作者相關建議，使其有所依循。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質性研究能深入描述特徵、探究事情發展的動態變化、發展相關理論以及解釋特定社會現象，為一種「過程和發現導向」的研究取向（鈕文英，2012）。個案研究為質性研究的一種取徑，用以探討由時間或空間所界定出某一範圍的系統（Creswell & Poth, 2017/2018）。家庭心理學則視家庭為一有機體，從系統、歷程及跨領域整合的角度，深入了解家庭成員間的互動（利翠珊，1999）。本文為探究家有青少年子女之東南亞跨國婚姻家庭親子互動經驗，故綜合個案研究取徑以及生態系統取向，以一個東南亞跨國婚姻家庭為個案，試圖透過同一家庭中所有成員對於親子互動經驗的相互對應，呈現多元觀點。

研究家庭之招募條件為臺籍男性與東南亞新住民女性經結婚組成的家庭，現定居

於臺灣、至少育有一名國中生子女，且親代與子代均有意願接受訪談。本文第一作者透過自身親友人脈認識一位符合條件的印籍新住民女性，約定見面後聆聽女子跨國結婚經過、感謝她的分享並簡要說明研究主題，在徵得其同意後，第一作者進而獲邀至家中拜訪，得以與其丈夫及2名國中生子女說明研究目的與研究方式，並回應成員們對研究的疑問。最終全家人均同意參與研究，成為本文之受訪家庭（以G家稱之）。

二、研究程序

（一）深度訪談

本文採半結構式深度訪談，因考量到共同訪談可能會影響家庭成員揭露之深度，甚至可能造成成員間的衝突，故而決定與G家每位家庭成員分別進行訪談。透過詳實說明研究目的、資料處理方式（匿名呈現）及提醒過程中會錄音，待受訪者同意後始進行訪談。訪談大綱分為親代與子代兩種版本，親代版本為：（1）基本資料（年紀、教育程度、工作、夫妻如何認識）；（2）家庭整體描述（家中作主者、家庭關係、共同參與之活動與相處經驗）；（3）親子互動經驗（包括孩子上國中後的變化、教養方式及教養困難之處、夫妻間的共親職、跨文化家庭經驗）；（4）父母對自身之角色扮演、意義、對子女之期待。子代版本為：（1）基本資料（年紀、教育程度）；（2）家庭整體描述（家中作主者、家庭關係、共同參與之活動與相處經驗）；（3）親子互動經驗（包括孩子上國中後與父母的相處情形、相處困擾及衝突、主觀認知父母對待自身及手足的差異、知覺父母的親職合作情況、跨文化家庭經驗）；（4）子女對自身之角色扮演、意義、對父母之期待。雖有具體之訪談大綱，然訪談時仍會依每位受訪者的回答作彈性調整。

每位成員均完成一次實地訪談，每次訪談皆由第一作者親自進行，訪談地點皆在G家客廳，每次訪談時間約為3-4小時。訪談期間為避免受訪者疲憊，第一作者間隔1小時即會詢問受訪者之狀態，視其需求休息片刻再接續訪談。訪談過程中，若家庭成員提及特定事件與親子互動議題相關，即會先徵詢該位受訪者的同意才會再詢問其他家人的觀點，以確保家人間的保密。研究期間並不會向其他家人透露個別訪談內容，但家人間可自主決定是否及如何分享訪談過程。

（二）資料處理與分析

所有錄音均謄寫成逐字稿。資料分析的程序參照Creswell與Poht（2017/2018）的分析方式，以及Van Parys等人（2017）對多位家庭成員的質性資料分析方法，分為以下步驟：（1）閱讀逐字稿與備忘錄註記：仔細閱讀逐字稿，並寫下對該位受訪者經

驗的想法感受及反思。(2) 編碼、分類與形成類別：以受訪者代號及說話句數為該段句子編碼，並註記個別事件與情境、寫下段落之摘述及初步類別，在反覆閱讀逐字稿時視情況修改或新增摘要及類別。如母親受訪時談及「姐姐有時候會回你一些成語，叫做什麼東西……她就跟我講那個，聽不懂，……我說那什麼意思，然後她就會跟妳說。」編碼為M-053，摘述重點為「子女成為教導者、媽媽成為被教導者」，經閱讀後初步命名類別「子女中文能力提升翻轉教養角色」。(3) 跨家庭成員分析：藉由反覆閱讀親代與子代的逐字稿及類別，將相似主題內容彙整、加以對照，找出共同類別。如從父母及子女的受訪逐字稿中得知父母雖非親自指導國中生子女作業，但會透過去圖書館、找補習班等方式予以協助，此部分之共同類別即為「運用多樣資源協助子女課業」。(4) 形成整體家庭的脈絡描述：根據前述之共同類別，本文將具關連性之共同類別合併成次主題，再進一步整理出主題範疇，歸納G家親子互動經驗之厚實描述。如「學校融入新住民文化課程」、「表弟出生引發子女學習印尼語動機」、「子女拜訪母親原生國家的文化體驗」，可合併成次主題「新住民母國文化在親子互動的契機乍現」，且將另一次主題「新住民母親教授子女母語遭隱微壓抑」進一步整理為「親子互動之跨文化經驗」的範疇。

作者們於分析過程中多次討論類別、次主題的命名，以確保研究嚴謹性與解釋有效性。接著將逐字稿分別整理出個別及整體家庭描述文，且考量到印籍新住民母親的中文識字能力，故提供紙本與錄音檔兩種形式給G家，請成員檢閱後回饋，以提升研究可信度，並讓成員了解哪些訪談資料會被呈現。G家成員在核對後均認為資料描述貼切，僅對於某些家庭事紀的年份做修正。最後將前述之描述文整理成長約1萬3千字的研究成果送給G家，內容包含致謝、家庭成員個別描述、家庭氣氛、家庭大事紀與家庭故事，並給予每位成員手繪卡片以表感謝。

三、受訪家庭概述

G家成員資料呈現如表1。G家是勞工家庭，居於巷弄內的舊式透天厝，經濟介於普通與小康間。F的父親是軍人，雙親皆已去世，現為技術員，工作型態作二休二，早上約6點半出門工作、晚上8點多才返家，休假日則常待在房內休息，故孩子反應有時會一整天都碰不到F，互動頻率與時間相對少。M為印尼華裔，原生家庭與在地文化貼近，印尼語是主要用語，亦會使用閩南語，華人文化主要具現在節日、拜拜與婚喪禮儀。M高中畢業後即透過人力仲介來臺工作，因而與F相識相戀並於2002年結婚，婚後4年D出生，隔年S出生。M婚後曾至補校學習中文，在2007年取得臺灣身份

證，自D上小學後即開始於中午時段在便當店兼職，約下午3點多返家準備晚餐。D已屆國三，有補全科會考複習班，吃完晚餐即趕著補習。國二的S未補習，放學後幾乎待在家中完成作業跟上網看影片。姐弟皆會與M分享學校趣聞，親子關係親密。在教養觀方面，雙親因各自的原生家庭背景，對子女教養著重的面向有著差異。M成長於大家庭，家人關係緊密且開放，不同輩份間常會互開玩笑、氣氛歡樂，也因此M會以朋友角色來與孩子互動，不過其對子女課業的要求較嚴格，應與其學業成績優異有關（高中就讀印尼第一志願學校）。F則生長於相對嚴肅的家庭，自認木訥寡言，其軍人父親常留在軍營，與F的互動較少，但F從父親身上學到良善的重要性，故期許自己的孩子要與人為善。相較於M的高成績要求，F較寬容但重視給予孩子生涯指引。

表1

G家成員資料

| 代號 | 稱謂 | 年齡 | 教育程度 | 訪談時長 |
|----|----|----|----------|-------|
| F | 爸爸 | 48 | 五專畢業 | 201分鐘 |
| M | 媽媽 | 42 | 高中畢業（印尼） | 261分鐘 |
| D | 姐姐 | 15 | 國三生 | 285分鐘 |
| S | 弟弟 | 14 | 國二生 | 173分鐘 |

參、結果與討論

為回應研究問題並具體呈現跨文化家庭的親子互動，本文從「青少年子女教養經驗」、「雙親共親職經驗」及「親子互動之跨文化經驗」三面向進行分析。

一、青少年子女教養經驗

此從「日常生活」及「學校課業」來說明：

（一）日常生活對子女的教養

1. 從強制規範到自主管理

以家庭生命週期之發展任務來看，當子女邁入青少年階段，家庭會面臨子女逐漸成熟自主及親子關係再調整等議題（McGoldrick et al., 2014）。G家的親子互動經驗自兩名子女陸續升上國中後即顯現此種家庭生命週期發展任務的特徵，對子女的日常

生活教養由命令轉為彈性自主的管教，並重視基本生活技能的指導及待人接物道理的教誨。其中管教的轉變體現在對子女生活常規的要求、零用錢的自主運用及出遊時對人身安全的重視等方面，皆從強制性地規範逐漸轉為給予孩子自主的空間與時間，如：

「身體好，不要學壞，就這樣，那你以後有什麼成就的話……當然是成就……你自己要去……怎麼講，操在自己的手上。」（F-689）

「以前……『弟弟下來吃飯！』那現在我快煮完了以後，我大概抓個15分鐘左右，『15分鐘後下來吃飯好嗎？』那他回答好的話，那你（弟弟）大概自己抓說，我大概15分鐘後我要寫到哪個段落，我就要下來了，因為我媽媽剛剛跟我說要吃飯了。」（M-327）

G家對於子女上國中後的教養從強制規範到自主管理，此轉變在雙親身上是一致的，也因此子女能感受自在，「我覺得爸爸媽媽的想法可能比很多家長還要來的開放很多，所以我覺得這個算是我跟爸爸媽媽相處的最大的一個好處、優點。」（D-755）探究雙親一致轉變的原因是兩人都認為子女進入青春期後，言行有所改變為正常現象，故應順其自然：

「正常吧！因為他們國高中那樣，一些改變吧個性。」（F-479）

「就把他當作正常啊，可能就青春期，身體的賀爾蒙可能在改變，然後……就讓他順其自然，可能他會好吧！」（M-475）

不過相較於F，作為主要照顧者的M在子女管教方式上的轉變更顯，如同黃淑玲（2008）所指，新住民母親在教養上展露出更多的信任與傾聽，以回應青少年子女的自主需求。本文進一步發現M認為子女上國中後應讓自己轉變為像朋友般給予關心的考量，除了與其原生家庭的相處方式相關，也希望能以身作則使子女學習到好的行為，意即M能自覺是子女主要照顧者，且能有所覺察與反思：

「就把他當作是朋友就好，關心他們……這個管教他們就是不要像他們還那麼小的時候，我說一就是一。……你的行為可能小孩子會去學，所以……就是……嗯……盡量控制自己。」（M-336、466）

2. 父主經濟、母主照顧的親職分工

G家在子女教養的親職分工符合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圖像，M作為主要照顧者的角色已如上所述，而擔負經濟責任的F則因個性較為木訥被動，加上工作因素與子女相處時間較短，此大致符合東南亞跨國婚姻家庭的父親形象（汪慧玲、沈佳生，

2014；胡瑞芬，2011）。然本文發現F仍盡心盡力展現父職角色，依其原生家庭經驗及工作的所見所聞給予子女相關建議，且尤為關心姊弟的視力健康，不惜花費重金也要幫他們配置高品質的眼鏡，可見作為經濟支柱因而在教養上較常缺席的F仍默默付出傳達父愛：

「爸爸說，那個……奶奶，我奶奶沒讀什麼書，然後爺爺在……也是在軍中，那以前沒有跟他講這些，他可能把以前沒有覺得……不夠好的，再跟我們分享，希望我們不要再走上他的路。」（D-170）

「媽媽比較care那個價錢，她一定要去找那種價錢她覺得可以的，就是壓得比較低。那爸爸是覺得，我品質好、你多收一點錢沒關係。」（D-126）

3. 子女中文能力提升翻轉家庭教養角色，並影響新住民母親的教養權能

本文發現，在跨國婚姻家庭系統中，隨著子女進入學校就學，其中文能力將逐漸超越母語非中文的新住民母親，既有「母親教養者」與「青少年子女被教養者」之間產生變化甚至翻轉。趙梅櫻（2011）指出子女與新住民母親的教養反轉體現在語言溝通上，在G家，身為主要教養者的M用中文與孩子互動時，有時會不懂某些中文的意思，而孩子也知道M不見得皆能理解中文，因此會再講解給M聽，形成姐弟是教導者、M是被教導者的情況：

「姐姐有時候會回你一些成語，叫做什麼東西……她就跟我講那個，聽不懂，……我說那什麼意思，然後她就會跟你說。」（M-053）

「媽媽有時候不懂，那就要用再白話一點的方式跟她講。」（D-047）

然而如此的角色翻轉遇上親子爭執時，將影響新住民母親的教養權能。當M被S指出「中文使用的矛盾」或「不合理」時，其會反覆思索自己的中文表達，且在日後提醒自己需更謹慎地應對：

「『弟弟，你還有什麼功課嗎？』『不要問我！』他就這樣回答。我說『啊我是關心你耶，我說難道你以後去工作的時候，老闆問你你還有多少報告還沒交，你就會回答老闆說不要問我？』『兩個事情是不同的事情，你不要把它混在一起！』……他回答兩個事情是不一樣的，不要混在一起講，……我就想說，欸，是不同的東西嗎？變成…變成我問我自己，這兩個是不同的東西？……所以現在講話要比較小心一點，因為他們會……就是……講一些……回你的時候，就會覺得好像也是！」（M-051、354）

感受中文能力對於教養子女可能產生的限制，M傾向以「當作自己上了一課」的態度來面對，「我就會說『哦是那樣子喔！』好，我大概學了一個東西這樣子。」(M-358) 加上子女願意不斷向其解釋中文辭彙意義，因此即使教養權能受到影響，M並未貶抑自己身為母親的教養者角色或降低自信。

(二) 教養子女之學業經驗

1. 新住民母親相當重視子女成績

G家姐弟的學業成績皆相當優秀，而M對子女的成績要求應是重要推力，若姐弟偶爾考差了，M即會詢問原因並討論解決之道：

「她(媽媽)就說，你這題是不會？還是粗心還是……怎麼樣，然後就開始問。……『這一次考試的考得比較好的，他這些題目有沒有錯？如果人家都對的話，他是怎麼會的？他去哪裡補習？』」(D-205、216)

「會問我名次啊，或者是有關成績的一些問題。例如說，為什麼這科比較差？」(S-383、S-384)

探究M如此重視子女成績的原因，應與其認為「有好的學歷才有好工作」的想法有關：

「你畢業後大家能做的工作，大家都在搶，那…應該薪水也是都差不多這樣子而已，但是……有一些工作，不是每一個人可以去做的，……好好的讀他的書，完成他的學業。」(M-492、488)

不過D則認為是因M以前在印尼的學業成績相當優秀，故對孩子的課業表現有相當期許：

「我也不知道跟媽媽小時候讀書有沒有關係，她說她高中是她那邊的第一志願，對，所以我在想她對讀書的要求，可能跟自己以前……她以前也是這樣要求自己的話，那現在也這樣要求我們。」(D-455)

F則認為成績維持在前五名即可，相較於成績，其更在意孩子的視力健康，由於姐弟的近視度數自小學至今快速增長，F因而希望他們在念書之餘也要適度休息：

「我兒子讀書習慣，習慣看東西很近，一年不到就加兩百度，所以他二三年級已經四、五百度，國小。所以就是……希望他們就是……雖然課業很重，可是我覺得眼睛更重要。」(F-359)

2. 運用多樣資源協助子女國中課業

在G家，兩名子女陸續升上國中後，課業難度提升，受限於教育程度以及主要照顧者M的中文識字能力，父母較無法應付，但會以其他方式提供協助，如帶子女去圖書館找資料、讓孩子上補習班問老師、買參考書等：

「有問題可以就是跟我講，有辦法解決我就解決，沒辦法可能就再想其他辦法。例如功課我沒辦法，你可能就是……送你去補習班，或是你去學校問老師問看看。」(F-671)

「就是要不要載你去書局啊、去圖書館啊，載你去找資料，還是你要先上網，在家裡先上網，找不到，要不要我載你去書局，還是去圖書館找，那再不行，那我要不要載你去補習班問老師。」(M-473)

感受到父母願意盡力協助學業，D與S亦願意自主學習，如會按照學校進度寫評量：

「就是可能下禮拜要小考，就會用這個六日，先把自己有買的那種評量，先把小考範圍讀過一遍、評量寫過一遍。」(D-111)

「那弟弟的話，他如果把他的功課都寫完了以後，他會寫評量，……就是有時間去寫評量，當作複習。」(M-166)

如前所述，M較F更重視子女的學業成績，故在學習資源的尋找與運用上更為積極，且善用通訊軟體掌握教育資源。M會與同鄉家長組成line群組，並透過地方政府或民間機關的官方帳號，獲得相關活動資訊後再與先生、子女討論：

「各高中的一些……展覽，有哪些科系啊，我們對這個不了解，我們可以去看看，去了解一下，帶著小朋友去看，欸，搞不好有看到他有興趣的。」(M-494)

「她(媽媽)是……就想說，小朋友放假，暑假就去參加一些……戶外的活動，然後可能有些是朋友知道，然後通知，那有些是那個……line裡面啊，OO(地方政府單位)什麼有些那個…一些line會出現的啊。……對啊，那這些家長，有時候他們就還是有聯絡，那互相有興趣。」(F-443、446)

對移民來說，同鄉網絡可提供就業機會、生活資訊、福利資源，或是住處分享、托育協助、鄉愁排解、新友結交等支持來源，亦是連結參與接待社會志願服務的重要管道(王翊涵, 2018; Lyons & Snoxell, 2005)。本文進一步指出，因著通訊軟體設備的發達與普及，同鄉網絡還能是新住民母親用以協助子女擴展學業資源的重要來

源。

3. 臺籍父親是子女生涯抉擇的諮詢者

D現就讀國三，適逢升學焦慮，是否補習、補習天數的拿捏及後續讀書的時間分配等，成為G家多番討論、爭執與抉擇的親子教養議題，而此實與G家重視子女學業表現密切攸關。值得注意的是，D每隔一段時間就要考會考模擬考，待成績出來後需依照模擬考成績試填志願序。雖D會與M先討論大概順序，但仍想詢問F的意見，顯見在跨國婚姻家庭中，對臺灣升學與職業生態相對熟悉的臺籍父親會是青少年子女在生涯抉擇的主要諮詢者：

「媽媽是比較少去講到以後的出路，因為……爸爸對於這個比較了解。……大部分是爸爸會給我建議……，以他過來人的經驗，就是他也是經歷的比我們多，看得比較廣，他就會跟我們分享一些他的經驗。」(D-621、737)

二、雙親共親職經驗

G家雙親與青少年子女互動上的共親職，主要展現在子女管教及參與子女學校活動等面向，並呈現出「依傳統性別角色分工進行管教」、「新住民母親是主要教養者，並積極把臺籍父親拉進教養同盟」、「雖是教養同盟然以夫為尊」等特點。

(一) 依傳統性別角色分工進行管教

林津如(2012)指出，跨國婚姻家庭若為中產階級或少部分收入較高的勞工階級，在教養子女上經常形成「男主外、女主內」的照顧方式，顯示社會階級與生產方式相當程度地影響教養子女的模式，且性別的影響亦交織其中。G家亦符合「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模式：如前所述，F是家庭主要經濟支柱，因工時做二休二，逢工作天會與子女的作息時間錯開，與子女較少互動；M則是配合姐弟的上下學時間，斷斷續續地兼差，以能承擔照顧及管教子女的責任。

值得注意的是，G家在傳統性別角色分工下已形成一套共親職的子女管教模式，由於F上班緣故多無法參與管教，故M會先對姐弟進行管教，待F下班，M即主動與其討論管教過程以確保兩人一致，後請F以父親身分再跟孩子強調父母立場，此時M就不會在場介入：

「我們兩個要先講好，……我會跟他(爸爸)說我的想法，……我昨天已經跟小孩講了，那你這邊再去跟他們講一下吧，我會那樣說，他就會自己找時間。那他什麼時候去講我也不要在場。」(M-374)

即使F無法即時參與姐弟發生爭執的管教時刻，M偶爾會把爸爸的角色搬出來，請姐弟站在她的角度思考並同理其處境，以平息手足間的紛爭：

「所以我有時候就是爸爸不在，我就會說你們兩個拜託一下，不要……害我也是跟著被唸啊幹嘛的。」(M-084)

(二) 新住民母親是主要教養者，並積極把臺籍父親拉進教養同盟

承上，在傳統性別角色分工下，M雖為主要教養者，然M仍積極把F拉進教養同盟，包括要求F簽成績單：

「我會讓爸爸簽，我要讓爸爸知道，對。因為平常每天聯絡簿大概都是大同小異，但是像成績單什麼的，我堅持要爸爸簽。」(M-389)

「就是有一些通知單，或是像聯絡簿那種通知單或者一些……像紙張的這種，媽媽就會叫爸爸簽。」(S-370)

或是讓F決定D是否可以與朋友出遊：

「那把這個事情推給爸爸，起碼她會跟爸爸聊一下嘛，比如說爸爸說『欸看什麼電影啊？電影名字是什麼啊？那跟誰啊？』」(M-387)

以及請F成為預防姐弟衝突的角色：

「比如說爸爸在這邊（客廳）滑手機，我會請爸爸上去樓上，在書房滑手機，因為兩個小孩在書房，爸爸在那邊兩個比較不會吵架。」(M-075)

G家成員都知道M積極增進F與子女互動的頻率，不過有各自的解讀與因應。F不清楚太太的想法但願意配合，「這我不知道，就變成這樣子，我也不知道她是怎麼想的。」(F-293) D不想思考原因，只希望涉及自身事務時能盡快獲得父母同意，因此會選擇父母都在場時詢問，「要找他們兩個都在場，這樣就不會說，問完這個又要再問。」(D-243) S則猜測M要給F看那些通知單可能是因為F比較看得懂，且這是一種謹慎的作法，「可能裡面就有一些要給家長看的東西，媽媽可能會給爸爸看，因為爸爸看可能會比較懂那個意思。……她希望給爸爸看，可能會比較謹慎一點吧。」(S-379、380)

然而M將F拉進教養同盟，是擬讓與子女互動處於被動的F能持續與子女建立情感連結，如同洪千惠（2011）所言，新住民母親在家庭內為維繫家人連結的角色：

「比如說她大學了以後，就住在外縣市，不在家裡，那你……如果你以前感情還不錯，但是因為你在外面，呃，差也不會差到哪裡呀，因為你從小都有在互動。」(M-399)

由上可知，在G家的共親職中，M是發動者，除了希望維繫處於被動角色的F能與子女間持續有連結，M另外思考的重點則與「性別文化」及「因金錢支付而衍生的決策權力」有關，將於下段說明。

（三）雖是教養同盟然以夫為尊

本文發現，雖M是教養同盟的發動者，但卻希望丈夫展現較多的教養決策權力，「第一個起碼尊重他嘛！」（M-392）此尊重映照出「以夫為尊」此種常見於跨國婚姻家庭的父權意識型態（王翊涵，2012；田晶瑩、王宏仁，2006）。在此性別脈絡下，M視先生為一家之主，因此有必要讓F知悉孩子的表現，「爸爸有時候說『媽媽簽就好啦！』我說不一樣。那小事情我簽聯絡簿，OK啊！對。但是這個你起碼看一下小孩的成績。」（M-389）

而隨著孩子步入青春期的階段，教養上需作決策的時刻也變多，M傾向讓F作決定，或由F授權自己作決定：

「今天要跟同學看電影或幹嘛，或是跟同學出去，啊一定先找媽媽，就問媽媽說我可不可以出去，……然後交代完囉，她就說『那你去問爸爸。』」（D-239）

「但是爸爸說問我的話，那我就直接馬上回答我的想法，可以或不可以。」（M-376）

值得注意的是，當涉及與「金錢支付」相關的事務時，M更會認為F應是決策者：

「成績單我堅持要爸爸簽，說給爸爸，讓爸爸看一下，你出了這個錢，補習，那你小孩補習真的有用嗎？對不對，那你可以自己評估。」（M-389）

「因為我叫她去問你，那就由爸爸去決定，那如果爸爸說好，那就讓她去吧。……那起碼爸爸也知道說妳女兒就是要花錢啊，因為金主還是爸爸啊。」（M-376、386）

G家在共親職的教養同盟中出現的即是以夫為尊的特點，且隨著孩子進入青春期的階段，以夫為尊就更為明顯。Blood與Wolfe（1960）提出夫妻間擁有較多經濟資源者，就較有權力進行家務分配與做決策。不過在G家，F的教養決策權力是由M賦予而獲得，其也願意配合執行，有著以夫為尊想法的教養者M認為主責家計維持角色的F應展現較多教養決策權力，特別是涉及青少年子女要參與需要花錢的活動時。易言之，G家的教養決策權力與經濟持有者之間並非絕對的因果關係，而是因父權意識型態的

連動影響，強化鞏固家庭經濟支柱與教養決策權力的關連。

三、親子互動之跨文化經驗

身為跨文化家庭的G家，由於M的印尼華裔背景，成員們均認為家內文化差異不大，「差不多吧！因為她本身就是……華人，……私底下還是講閩南語，生活一樣有拜拜什麼的。」（F-637）「我們是，也是華人吧！也是佛教，也是拜拜、初一十五那些，都差不多啊，像結婚那些，都差不多。」（M-419）「媽媽是……印尼華僑，所以其實很多習俗跟臺灣差不多。」（D-668）「像過年，他們也會去拜年、端午節也會吃粽子，所以很多習俗都跟我們一樣。」（S-772）

即便如此，來自印尼的M仍帶著當地生活的智識與文化與F共組家庭，在親子互動中仍會見到跨文化的實踐。當論及夫妻兩人不同的原生文化如何具現在親子互動時，可發現M的印尼母國文化遭隱微壓抑，尤其是「語言教授」，F不認同M教導子女印尼語。然隨著孩子漸長及相應契機的出現，M的印尼語教授及其他印尼文化得以顯現在日常親子互動中。

（一）新住民母親教授子女母語遭隱微壓抑

黃淑婧等人（2010）指出新住民母親在教養學齡前子女時，受到原生家庭及原生母國文化影響，希冀孩子能了解母國語言及風俗習慣，但仍會以夫家信念作為優先考量。M曾在D三歲時教一些簡單的印尼數字，F雖覺得學習簡單的印尼語沒問題，但也認為印尼語在臺灣無用武之地，且擔憂會影響中文學習，因此並不認同繼續教導，之後M就沒有特別再教導姐弟印尼語。D對於小時候媽媽教印尼語有些許印象，但何以媽媽沒有繼續再教，D猜測中文為臺灣常用語言，若可用中文溝通，毋須再多學印尼語：

「OK啊，因為她教都是教很簡單的，1到10啊，教一點點而已。」（F-644）

「我先生也沒有說什麼……很……就是說很認同說，欸你去教他印尼文沒關係那樣，因為他就覺得，這個用不到啊！……到時候反而會了印尼文，中文學不好。」（M-407、409）

「可能是因為我們已經會中文了吧，覺得中文就可以溝通，為什麼要去多學一個語言。」（D-708）

在跨文化家庭中，教養決策權取決於擁有較多權力的一方，使得另一方順從對方的文化規範、隱蔽了自身的母國文化（Bhugu, 2017）。以G家經驗來看，在以夫為

尊、金錢支付的影響下，F成為擁有較多權力的教養決策者，即便作為主要教養者的M想教授子女印尼語，仍以先生為主，其亦開始覺得學印尼語並無用處，因此順應臺灣的主流語言論述。G家在語言傳授上雖無明顯反對衝突，但由於夫方不認同，M的印尼語教授被隱微壓抑，語言教授成為雙親在跨文化之教養權力展現的場域。

（二）新住民母國文化在親子互動的契機乍現

新住民母親對子女的母語教授在家庭系統內受到隱微壓抑，然因著家庭外相關系統的改變，M的母國文化傳承與教授在親子互動上乍現契機。

1. 學校融入新住民文化課程

隨著姐弟入學，學校的新住民文化課程提供了在教育體制中接觸印尼文化的機會。姐弟會跟M討論上課所學，M也樂於分享所知，或偶爾透過社群軟體和印尼朋友聊天互動，再和姐弟分享印尼的狀況與文化：

「有時候學校會有一些新住民，教一些新住民的話，也是講座那樣，然後就會跟她（媽媽）聊，然後她就會跟我們講，他們那些節日會做些什麼。……有時候她會在那個app上面跟（印尼）同學聊天，然後同學可能會有時候會跟她講，今天是什麼什麼日子，然後她有時候就會跟我們講。」（S-676、681）

「國小國中會要做那種簡報啊，對啊，介紹不同國家，那這時候我就會選印尼介紹，這樣我了解的可能比我上網查的還要來的多，直接問媽媽就知道了。」（D-713）

2. 表弟出生引發子女學習印尼語動機

2017年，住在G家附近的舅舅一家生了一個兒子¹。自表弟出生後舅舅即和他以印尼語溝通，而到彼此家中作客時，姐弟因要與表弟玩耍，展現了學習印尼語的興緻與動機：

「因為他（表弟）的關係，我這兩個（姐弟）慢慢在學印尼文。」（M-407）

「其實中文就可以通了，但是跟他講印尼文變成是說，我們在練習。」（D-693）

¹「舅舅」是M的哥哥，舅舅的兒子則為D、S的表弟。於後文皆以舅舅、表弟稱之。舅舅為何來到臺灣定居，本文未收集相關資料。

「啊舅舅在表弟小時候就開始教他印尼文，然後要跟他溝通就跟著學。」

(S-020)

跟表弟互動成為姐弟開口練習印尼語的契機，他們都想繼續學習印尼語，D對於沒能像表弟一樣從小開始學印尼語感到可惜，特別是當下逢升學考試，D需花較多心力準備會考：

「如果小時候就像那個弟弟那樣學的話，應該……對我們現在也會有一點幫助。可惜那時候就是沒有，那沒有學也就算了，也就沒關係，畢竟現在如果要真的學的話，也是要花一些時間，那就等以後有時間再說。」(D-697)

相較於D，S更積極地展現學印尼語的熱誠，除了能與表弟互動，其也意識到印尼語與M的連結，因此會積極找尋學習方法，或是遇有不懂的地方及延伸的單詞就會詢問M，印尼語學習成為母子互動的一部份：

「因為媽媽是印尼來的，所以就學印尼文。……就可能跟表弟玩的時候，玩一玩然後……也是問媽媽，有沒有這個詞、延伸一點的詞，可以學起來。」

(S-708、722)

「比如說我跟他講一個印尼話，他大概會抓一下，他用英文的拼法去拼一下，大概他知道，然後他也會用APP去下載，然後這個字怎麼念，他學得反而更快。」(M-410)

3. 子女拜訪母親原生國家的文化體驗

2019年的農曆過年適逢M高中畢業20周年同學會，且舅舅一家也想返鄉探親，M考量到孩子都未曾去過印尼，決定帶姐弟一同返鄉，F則因工作因素未能前往。隨M返鄉探親是G家親子互動上一個特別的跨文化經驗，此讓M的母國文化教授實體發生，姐弟有機會體驗印尼華人的走春文化：

「我就是想要讓他體驗一下，印尼的過年這樣，跟臺灣有一點點不一樣，一樣是有吃團圓飯這樣，但是就是……一家一家的拜年，從坐車到走路，因為有的是親戚是住很近，用走路的就可以到，所以車子停在那邊，然後用走路去這一家，又去那一家那樣子，然後人家就會包紅包給他們。」(M-433)

並能實際知道印尼華人的語言使用、說話方式，及宗教和臺灣的相異之處：

「像講話很明顯的差異是，我們回去印尼的時候，阿嬤跟阿公講的，聽得懂，但是用詞方面會跟我們不一樣。」(D-748)

「我們會說參雜印尼文的中文，就像新加坡會參雜一些……馬來文或英文，對對對，那我們那邊也是，包含我爸爸，他如果跟弟弟講話，也是會參雜一兩句的印尼文。」(M-455)

「就覺得那個伊斯蘭教、穆斯林，可能他們覺得我們很奇怪吧，……我們當然是短袖短褲啊，他們那邊全都包得緊緊的。」(D-672)

姐弟對於能夠親自到印尼體驗在地文化皆持正面想法，認為能多知道不同國家的文化很有趣，對此新知展現開放接納的態度：

「有時候可以了解比較多國家的東西。」(D-713)

「就可以多知道一個國家的文化。覺得很有趣啊！」(S-759、760)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文呈現一個育有青少年子女之臺印跨國婚姻家庭的親子互動經驗，透過個別訪談臺籍父親、印籍新住民母親及兩位國中生姐弟，彙整出此家庭在青少年子女教養、雙親共親職及親子互動之跨文化經驗的樣貌。首先在子女教養部份，本文整理出此家庭依著子女步入青春期後產生教養轉變——從強制規範轉為讓子女自主管理。「父主經濟、母主照顧」的親職分工是主要的教養方式，體現在生活照顧與學業學習，過程中隨著孩子成長與接受學校教育，新住民母親與青少年子女的中文能力落差影響著彼此互動，不僅翻轉教養者與被教養者的角色，亦影響母親的親職權能展現，特別是親子爭執發生時。再來是共親職部份，「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是此臺印跨國婚姻家庭實踐親職的模式，雖印籍新住民母親是子女教養主要執行者，但為能促進臺籍父親與青少年子女的互動，加上父權意識型態與先生是家中經濟來源者的影響，母親會積極把先生拉進教養同盟，並在重要教養決策事件（尤其涉及金錢支付）上傾向「以夫為尊」。最後在親子互動的跨文化經驗中，本文之家庭因母親的華裔背景，成員感受的文化差異並不大，不過當新住民母親擬教授子女印尼語時，可發現臺籍父親與印籍新住民母親親職權力行使的落差，母親的母語教授在子女教養中受到隱微壓抑，然隨著學校融入新住民文化課程、母方親戚引發的學習印尼語動機，及青少年子女有機會隨母返鄉實際體驗印尼文化等契機出現，印籍新住民母親的母國文化能逐漸具現在親子互動上。

本文基於上述結論並將之與生態系統觀點進行對照，可歸納兩點研究發現：

(一) 東南亞跨國婚姻家庭形成正向動力系統對親子互動有重要性

相較於既有文獻呈現東南亞跨國婚姻家庭的教養困境，本文G家的親子互動圖像較少出現困境文本，此或許與臺籍父親有穩定收入、印籍新住民母親的華裔背景與盡力照顧家庭、子女學業成績頗佳、子女願意聽從教養，甚或舅舅一家為重要支持網絡等因素有關。不過此家庭在親子互動上能展現優勢，實與內、外在系統形成正向動力運作相關：

1. 雙親有一致的教養觀念並能形成共親職共識

G家臺籍父親與印尼新住民母親能有一致的教養觀念，並能形成共親職共識，如「從強制規範到自主管理的教養方式轉變」、「父主經濟、母主管教的親職分工」、「母先管教、父再強化的管教方式」、「母重成績、父願配合的學業要求」等。特別是當子女步入青春期、面對子女逐漸成熟並尋求獨立自主而需調整親子互動模式（McGoldrick et al., 2014），此種雙親教養態度的一致更顯重要，此也可從G家姐弟在訪談中表達肯定的態度得到驗證。

2. 印籍新住民母親的積極行動與臺籍父親的被動配合均發揮作用

在G家，較少出現既有文獻所提因雙親文化差異而產生教養衝突的現象（Bhugun, 2017），除了新住民母親的華裔背景，本文更看到主責教養的母親展現積極性與行動力。雖新住民母親在母職的能動性（agency）已見於既有文獻（例：王翊涵，2011；吳瓊洳、蔡明昌，2014；馮涵棣、梁綺涵，2008；Wang, 2010），不過本文發現，面對子女步入青春期，新住民母親有著不一樣的積極行動力，像是當子女升上國中後課業難度增加，受限於中文識字能力與不熟稔臺灣教育體制的新住民母親可善用通訊軟體與同鄉網絡來積極擴展子女的學習資源；或當感受青少年子女的中文能力超越自己而影響親職權能時，其願意調整心態與互動方式；或積極將在教養上處於被動的先生拉進教養同盟。

值得注意的是，相關文獻指出臺籍父親在親子互動上的消極態度（汪慧玲、沈佳生，2014；魏佩君、陳芳茹，2014），然本文進一步發現，臺籍父親的被動角色可以發揮功能：當其願意配合主責教養之新住民太太參與共親職，不僅能避免衝突，亦能助益正向的家庭親子互動系統。

3. 家庭成員善用跨文化的相近性並接納差異性

本文發現G家在親子互動上能形成內部正向氛圍，應與彼此均認為母親的華裔背景和臺灣在地文化無太大差異有關，本文如此說明並非意指有較高的文化相近性就會有較佳的親子互動，而是欲強調當跨國婚姻家庭成員能夠肯認（recognize）家內跨文化的相近性時，較易產生認同氛圍、助益親子互動。

然跨文化家庭確實存在文化差異，當來自不同國家的雙親要置入原生文化於親子教養時，東南亞跨國婚姻因著夫妻權力及語言位階關係（中文比印尼語實用），可能出現新住民母國文化被抑制的情況。G家經驗顯示新住民母親教授子女印尼語時受到隱微壓抑，然因教育政策此大系統有所調整、學校教育此外在系統融入新住民文化課程，加上G家青少年姐弟與表弟互動後、隨母返鄉親身體驗印尼文化之中系統的變化，印籍新住民母親的母國文化得以在親子互動中再現，此也說明家庭成員接納跨文化差異性的重要。

G家在親子互動上所顯現的接納文化差異性，亦反映在青少年子女理解新住民母親不諳中文，且願意持續跟母親解釋中文詞彙意涵，也因此當教導者／被教導者的角色因中文識字能力而被翻轉時，仍擁有和諧之互動氣氛，不過當發生親子爭執時，此種接納易被忽略，新住民母親的親職權能即受到影響。

（二）受到性別文化、家計維持角色及在地教育體制優勢等影響，新住民母親雖是主要教養者，然臺籍父親是教養決策者與生涯諮詢者，在子女步入青春後更為明顯

過往研究指出在東南亞跨國婚姻家庭中，父親多為主要決策者，特別是在教養子女上（曾美嘉，2006；黃淑婧等人，2010）。本文透過一個臺印跨國婚姻家庭所有成員的訪談結果，對於教養決策的運作有更細膩的發現：G家的親職分工不僅符合「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性別角色分工，作為主要教養者的新住民母親亦在父權意識型態的影響下傾向「以夫為尊」，認為先生應在重大教養事件上作決定，而隨著子女步入青春，有愈來愈多涉及金錢支出的活動參與（如補習、與朋友出遊），新住民母親更認為需由負責金錢支付、同時也是家庭經濟來源者的先生作決策。

此外相較於新住民母親，對臺灣升學體系及職業生態相對熟悉的臺籍父親是青少年子女面對生涯議題時的主要諮詢者，父親能根據自身經驗給予子女升學及未來工作的建議，此種提供子女生涯建議之父職實踐，在此家庭發展階段發揮重要功能，同時亦呈現出家有青少年子女的東南亞跨國婚姻家庭會面臨到的特殊議題：相較於對臺灣

升學體制及職業環境不甚熟悉的新住民母親，父親在此部分的父職參與是相當關鍵的角色。

二、建議

本文探究家有青少年子女之東南亞跨國婚姻家庭親子互動經驗，並以一個臺印跨國婚姻家庭作為個案，雖無法類推至其他跨國婚姻家庭，然根據研究結果與發現，本文對諮商實務工作者在服務育有青少年子女之臺印跨國婚姻家庭或其他東南亞跨國婚姻家庭時提出建議，並提出未來研究可持續發展的方向：

（一）需關注不同系統與面向帶給臺印跨國婚姻家庭親子互動經驗之正向影響

本文呈現臺印跨國婚姻家庭親子互動確實受到內外系統的影響，並彙整出能引發正向經驗的因子，如新住民母親的積極行動力、臺籍父親願意配合並適時展現父職功能、雙親有一致的教養觀念並能形成共親職共識、家庭成員能善用跨文化的相近性並接納差異性、家庭外的系統能展現肯定新住民母國文化的政策與氣氛等。本文因此建議諮商實務工作者可關注不同系統與面向帶給育有青少年子女之臺印跨國婚姻家庭親子互動經驗的正向影響，留意案主／家庭之優勢資源，幫助其覺察與發掘自身／家庭所擁有之優勢面向，進而能反映在親子互動中。

（二）能敏覺於臺印跨國婚姻家庭中隱微的權力運作議題

本文指出臺印跨國婚姻家庭的雙親會因跨文化、性別規範、家庭經濟主責者、對在地教育體制的熟悉等因素而產生不同的親職權力運作，經濟因素與父權意識形態亦相互交織，影響雙親之間的共親職模式。此外中文能力的掌握也會改變新住民母親與青少年子女親子互動的樣態，特別是當彼此有爭執發生時，母親的親職權能將受影響。當案主或案夫妻呈現教養困境時，除了理解其教養脈絡，本文建議諮商實務工作者敏覺於跨文化間的權力運作：其一是雙親間如何教養子女，其二是新住民家長與青少年子女的親子互動，進而協助其發展出適當的因應方式並縮減權力差異，促進共親職或親子間的平衡與共識。

（三）能具備關於東南亞跨國婚姻家庭的先備知識，同時檢視自身視框、善用系統觀點

本文建議諮商實務工作者在與東南亞跨國婚姻家庭之案主或案家工作前，對此類家庭需有基礎了解，包含東南亞跨國婚姻家庭在臺灣之形成脈絡與所面臨的處境，以及現行之相關政策、輔導處遇等先備知識。在具備此部分之先前理解之餘，諮商實務

工作者亦需留意到每個案主及其家庭皆有其獨特樣貌，因而需時時檢視自身視框，反思所處的系統及信念如何影響諮商實務，不被既有想像所框限，如僅聚焦在困境層面而忽略其所擁有的優勢面向。

此外本文將一個臺印跨國婚姻家庭之所有成員納入訪談，亦發現以家庭整體為單位之系統觀點來了解跨文化家庭親子互動，裨益掌握家庭整體樣貌，並能同時顧及每位成員的意見與想法，故本文亦建議諮商實務工作者應善用系統觀點進行案家概念化並形成處遇計畫。

(四) 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本文為單一個案研究，深入剖析一個育有青少年子女之臺印跨國婚姻家庭的親子互動經驗，未來建議可針對多元類別（如不同婚配形式、家庭成員組成、社經地位）的東南亞跨國婚姻家庭進行多個案研究，以獲得更多元之親子互動經驗。另本文之親子互動特別聚焦於教養、共親職及跨文化經驗，然親子互動內涵絕不僅於此，建議未來研究可聚焦在跨文化家庭親子互動的其他面向，如跨文化差異可能引發的衝突議題等。

參考文獻

- 內政部移民署（2020年6月25日）：外籍配偶與大陸（含港澳）配偶人數。[National Immigration Agency, M. O. I. (2020). *Number of foreign spouses and spouses in mainland China (including Hong Kong and Macao)*.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5382/5385/7344/7350/8887/?alias=settledown>]
- 王宏仁（2001）：社會階層化下的婚姻移民與國內勞動市場：以越南新娘為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41，99-127。[Wang, H. Z. (2001). Social stratification, Vietnamese partners migration and Taiwan labour market.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41, 99-127. <https://doi.org/10.29816/TARQSS.200103.0003>]
- 王翊涵（2011）：「我很辛苦，可是我不可憐！」東南亞新移民女性在台生活的優勢觀點分析。臺大社會工作學刊，23，93-135。[Wang, Y. H. (2011). "My marital life is hard, but I am not pitiful!" Analyzing Southeast Asian immigrant wives' lives in Taiwan through strengths perspective. *NTU Social Work Review*, 23, 93-135. <https://doi.org/10.6171/ntuswr2011.23.03>]
- 王翊涵（2012）：曖昧的歸屬，策略性的協商：在台東南亞新移民女性的國族認同。臺灣社會研究季刊，89，83-126。[Wang, Y. H. (2012). Ambiguous belonging, strategic negotiation: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of Southeast-Asian immigrant wives in

- Taiwan.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89, 83-126. <https://doi.org/10.29816/TARQSS.201212.0003>]
- 王翊涵（2018）：與姐妹志工一起工作：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支持性志願服務初探。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22**（2），49-94。[Wang, Y. H. (2018). Working together with 'Jiemei' volunteers: Exploring the supportive volunteering for immigrant wives in service centers for new immigrant families. *Social Policy & Social Work*, 22(2), 49-94. [https://doi.org/10.6785/SPSW.201812_22\(2\).0002](https://doi.org/10.6785/SPSW.201812_22(2).0002)]
- 田晶瑩、王宏仁（2006）：男性氣魄與可「娶」的跨國婚姻：為何臺灣男子要與越南女子結婚？臺灣東南亞學刊，**3**（1），3-36。[Tien, C. Y., & Wang, H. Z. (2006). Masculinity and cross-border marriages: Why Taiwanese men seek Vietnamese women to marry? *Taiwa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3(1), 3-36. <https://doi.org/10.7039/TJSAST.200604.0003>]
- 朱柔若、孫碧霞（2010）：印尼與大陸配偶在臺社會排除經驗之研究。教育與社會研究，**20**，1-52。[Chu, J. J., & Sun, P. H. (2010). A social exclusion study of Indonesian and Mainland Chinese spouses in Taiwan. *Formosan Education and Society*, 20, 1-52. <https://doi.org/10.6429/FES.201006.0001>]
- 江守峻、陳婉真、郭瓏灑（2017）：迂迴的置身處境：東南亞新住民諮商的多元文化省思與挑戰。臺東大學教育學報，**28**（2），61-96。[Chiang, S. C., Chen, W. C., & Kuo, L. Y. (2017). Detouring situatedness: Multicultural reflections and challenges in the counseling of Southeast Asian immigrants. *NTTU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28(2), 61-96.]
- 利翠珊（1999）：家庭心理學的系統觀點與研究。應用心理研究，**2**，21-40。[Li, T. S. (1999). The systems perspective in family psychology. *Research in Applied Psychology*, 2, 21-40.]
- 吳欣璇、金瑞芝（2011）：華人家庭文化脈絡下新住民母親的親子關係—以一柬埔寨出生與越南長大的新住民母親為例。應用心理研究，**51**，111-148。[Wu, H. H., & Chin, J. C. (2011). The mother-child relationship of an immigrant mother within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Chinese family: A case study of a Cambodian-born Vietnamese mother. *Research in Applied Psychology*, 51, 111-148.]
- 吳瓊洳、蔡明昌（2014）：新住民家長參與親職教育課程之行動研究。嘉大教育研究學刊，**32**，1-32。[Wu, C. J., & Tsai, M. C. (2014). Action research of parent education curriculum for new immigrant parents.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32, 1-32.]
- 汪慧玲、沈佳生（2014）：新移民家庭父職參與和親子互動關係之研究。人文社會科

- 學研究，8（4），21-39。[Wang, H. L., & Shen, C. S. (2014). A study of paternal involvement and parent-child interrelationship of new immigrant families. *NPUST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8(4), 21-39. [https://doi.org/10.6284/NPUSTHSSR.2014.8\(4\)2](https://doi.org/10.6284/NPUSTHSSR.2014.8(4)2)]
- 林津如（2012）：性別、文化與族群：跨國婚姻的家庭關係與新移民女性的認同形構。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13（4），38-46。[Lin, J. J. (2012). Gender, culture and ethnicity: Family relationships of transnational marriage and identity formation of new immigrant wome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13(4), 38-46.]
- 林雅萍、林惠雅（2009）：父母共親職互動歷程的面貌。本土心理學研究，32，41-97。[Lin, Y. P., & Lin, H. Y. (2009). Patterns of coparenting processes. *Indigenous Psychological Research in Chinese Societies*, 32, 41-97. <https://doi.org/10.6254/2009.32.41>]
- 洪千惠（2011）：東南亞新移民夫妻之家的意義建構研究（未出版之博士論文）。國立彰化師範大學。[Hung, C. H. (2011). *The construction of family meaning among Southeast Asian new immigrant couples in Taiwan* (Unpublished doctor's thesis).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 胡瑞芬（2011）：跨國婚姻家庭男性對父職的認知與實踐（碩士論文，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Hu, R. F. (2011). *Men 's cognition and practice of fatherhood in transnational marriage family*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National Digital Library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in Taiwan. <https://hdl.handle.net/11296/n86m57>]
- 夏曉鵬（2000）：資本國際化下的國際婚姻—以臺灣的「外籍新娘」現象為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3，45-92。[Hsia, H. C. (2000). Transnational marriage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apital—the case of the "foreign bride" phenomenon in Taiwan.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3, 45-92. <https://doi.org/10.29816/TARQSS.200009.0002>]
- 高淑清、廖昭銘（2004）：父母親職經驗之現象詮釋：以家有青春子女為例之初探。應用心理研究，24，117-146。[Kao, S. C., & Liao, C. M. (2004). Interviewing parents of adolescents: Interpreting on their lived experience of parenting. *Research in Applied Psychology*, 24, 117-146.]
- 張雪君、劉由貴（2010）：從多元文化觀點探討來台女性新移民的文化衝擊——兼論苗栗縣政府的作法。區域與社會發展研究，1，103-126。[Chang, H. C., & Liu, Y. G. (2010). From the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 to explore female immigrants' cultural shock. *The Journal of Region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Research*, 1, 103-126.]

- 張智嵐（2019）：跨越文化的父母心—新住民家庭共親職歷程初探。諮商與輔導，400，42-45。[Chang, C. L. (2019). Parents' love and care crossing cultures: An initial exploration of co-parenting process in new resident families. *Counseling & Guidance*, 400, 42-45.]
- 教育部（2019年6月3日）：新住民子女就讀國中小人數分布概況統計。[Ministry of Education. (2019). *Population statistics and distribution of new resident students in elementary schools and junior high schools*. http://stats.moe.gov.tw/files/analysis/son_of_foreign_107.pdf]
- 許育光（2020）：主編的話：兒童諮商與親師諮詢—生態系統觀點的實務與研究反思。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57，1-16。[Hsu, Y. K. (2020). Editor's preface: Child counseling and parent/teacher consultation: The practice and research reflection through ecological system perspective. *Chinese Journal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57, 1-16. <https://doi.org/10.3966/172851862020010057001>]
- 許雅惠（2009）：魚與熊掌：新移民婦女的社會資本分析。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13（2），1-54。[Sheu, Y. H. (2009). At the intersection of gender and ethnic: Analyzing immigrant wives' social capital. *Social Policy & Social Work*, 13(2), 1-54. <https://doi.org/10.6785/SPSW.200912.0001>]
- 陳志賢（2016）：東南亞國際婚姻文化衝突與家庭調適歷程之研究。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與學報，29，87-116。[Chen, C. H. (2016). Cultural conflicts and family adjustment in Southeastern Asia international marriages.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29, 87-116.]
- 曾美嘉（2006）：跨國婚姻家庭父親角色及子女教養經驗之探究（碩士論文，朝陽科技大學），臺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Tseng, M. C. (2006). *A study on the fatherhood and the experience of children rearing in transnational marriage* (master's thesis,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ational Digital Library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in Taiwan. <https://hdl.handle.net/11296/rj4ra2>]
- 曾素秋（2009）：臺灣—東南亞跨國婚姻家庭的親子關係—子女的視角（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暨南大學。[Tseng, S. C. (2009).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through the child's eyes: Cross-border marriage families between Taiwanese men and Southeast Asian women*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 鈕文英（2012）：質性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雙葉書廊。[Niew, W. I. (2012).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and thesis writing*. Yeh Yeh Book Gallery.]
- 馮涵棣、梁綺涵（2008）：越南媽媽·台灣囡仔：臺越跨國婚姻家庭幼兒社會化之初探。臺灣人類學刊，6（2），47-88。[Fung, H. L., & Liang, C. H. (2008).

- Vietnamese mothers, Taiwanese children: Socializing practices with young children in Sino-Vietnamese cross-border marriage families in Taipei, Taiwan. *Taiw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6(2), 47-88. <https://doi.org/10.7115/TJA.200812.0047>
- 黃淑玲（2008）：撥雲見日一家有青少年新移民女性之母職經驗（碩士論文，國立嘉義大學），臺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Huang, S. L. (2008). *The first sunlight beyond the clouds: Researching the motherhood experiences for the newly immigrant females with teenaged children*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National Digital Library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in Taiwan. <https://hdl.handle.net/11296/qmva74>]
- 黃淑嫻、蔡秋桃、曹惠雅（2010）：外籍母親對學齡前子女教養信念之研究。《幼兒保育學刊》，8，17-40。[Huang, S. J., Tsai, C. T., & Tsao, H. Y. (2010). A study of foreign mothers' cultivating beliefs about educating preschool-aged children. *Journal of Child Care*, 8, 17-40. <https://doi.org/10.6433/JCC.201009.0017>]
- 黃勝美（2013）：探究新移民家庭青少年知覺之家人關係～以高雄地區國中生為例（碩士論文，國立中山大學），臺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Huang, S. M. (2013). *A study on adolescents' perception towards family relationships in immigrant families in Kaohsiung*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National Digital Library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in Taiwan. <https://hdl.handle.net/11296/a76x5g>]
- 詹火生、陳芬苓（2014）：我國外籍配偶弱勢情境分析之研究。內政部移民署102年度「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補助研究計畫案期末報告。未出版。[Chan, H. S., & Chen, F. L. (2014). *Research of foreign spouses' underprivileged situation analysis in Taiwan*. National Immigration Agency, M. O. I. Unpublished.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media/43517/%E6%88%91%E5%9C%8B%E5%A4%96%E7%B1%8D%E9%85%8D%E5%81%B6%E5%BC%B1%E5%8B%A2%E6%83%85%E5%A2%83%E5%88%86%E6%9E%90%E4%B9%8B%E7%A0%94%E7%A9%B6.pdf>]
- 趙梅櫻（2011）：新移民婦女母職與其青少年子女親子互動之研究（碩士論文，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臺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Chao, M. Y. (2011). *The research on the motherhood of immigrant females and the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with their teenage children*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tional Digital Library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in Taiwan. <https://hdl.handle.net/11296/9ftj2n>]
- 潘淑滿、楊榮宗（2013）：跨國境後之主體形成：婚姻移民單親母親的在地與跨境協商。《臺大社工學刊》，27，135-184。[Pen, S. M., & Yang, J. T. (2013). Subject

- construction after cross-border: Immigrant lone mothers and their local and cross-border negotiation. *NTU Social Work Review*, 27, 135-184. <https://dx.doi.org/10.6171/ntuswr2013.27.04>]
- 蔡秋雄（2010）：新移民家庭中「新台灣之子」親職化經驗研究。家庭教育雙月刊，23，24-41。[Tsai, C. H. (2010). A study on parentification experiences of “new Taiwanese children” in new resident families. *Journal of Family Education Bimonthly*, 23, 24-41.]
- 鄧蔭萍（2016）：台灣新移民女性母職角色之探討--家庭生命週期觀點的分析。民生論叢，12，51-84。[Teng, Y. P. (2016). Perspectives of immigrant wives on mothering experiences in Taiwan: Based on the family life cycle approach. *Human Ecology: Vision and Insight*, 12, 51-84.]
- 蕭昭娟（2000）：國際遷移之調適研究：以彰化縣社頭鄉外籍新娘為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Hsiao, C. C. (2000). *Adaptation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 case study of foreign bride s in Changhua county*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National Digital Library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in Taiwan. <https://hdl.handle.net/11296/nheedh>]
- 魏佩君、陳芳茹（2014）：越南家庭孩子出生至小學階段的父職經驗。幼兒教育研究，6，75-101。[Wei, P. C., & Chen, F. J. (2014). The lived experiences of fathers who married Vietnamese women and have children under twelve years old.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Research*, 6, 75-101.]
- Adams, R., & Laursen, B. (2001). The organization and dynamics of adolescent conflict with parents and friend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3(1), 97-110. <https://doi.org/10.1111/j.1741-3737.2001.00097.x>
- Bhugun, D. (2017). Intercultural parenting in Australia: Managing cultural differences. *The Family Journal*, 25(2), 187-195. <https://doi.org/10.1177/1066480717697688>
- Bhugun, D. (2019). *Intercultural parenting and relationships: Challenges and rewards*. Springer.
- Blood, R. O., & Wolfe, D. M. (1960). *Husbands and wives*. The Free Press.
- Collins, W. A., & Laursen, B. (2004). Parent-adolescent relationships and influences. In R. M. Lerner, & L. Steinberg (Eds.), *Handbook of adolescent psychology* (2nd ed., pp. 331-362). Wiley.
- Creswell, J. W., & Poth, C. N. (2018)：質性研究的五種取徑（李政賢，譯）。五南。（原著出版年：2017）[Creswell, J. W., & Poth, C. N. (2017). *Qualitative inquiry and research design: Choosing among five approaches* (C. H. Lee, Trans.). WU-NAN.]

- Crippen, C., & Brew, L. (2007). Intercultural parenting and the transcultural family: A literature review. *The Family Journal, 15*(2), 107-115. <https://doi.org/10.1177/1066480706297783>
- Goldenberg, I., Stanton, M., & Goldenberg, H. (2017). *Family therapy: An overview* (9th). Cengage.
- Lyons, M., & Snoxell, S. (2005). Creating urban social capital: Some evidence from informal traders in Nairobi. *Urban Studies, 42*(7), 1077-1097. <https://doi.org/10.1080/00420980500120865>
- McGoldrick, M., Carter, B., & Garcia Preto, N. (2014). Overview: The life cycle in its changing context. In M. McGoldrick, E. A. Carter, & N. Garcia-Preto (Eds.), *The expanded family life cycle: Individual, family, and social perspectives* (4th ed., pp. 1-19). Pearson.
- McHale, J. P., & Irace, K. (2011). Coparenting in diverse family systems. In J. P. McHale, & K. M. Lindahl (Eds.), *Coparenting: A conceptual and clinical examination of family systems* (pp.15-37).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https://doi.org/10.1037/12328-000>
- Peterson, G. W., & Hann, D. (1999). Socializing children and parents in families. In B. S. Marvin, K. S. Suzanne, & G. W. Peterson (Eds.), *Handbook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2nd ed., pp. 327-370). Springer.
- Ruebelt, S. G., Singaravelu, H., Daneshpour, M., & Brown, C. M. (2016). Exploration of cross-cultural couples' marital adjustment: Iranian American women married to European American men. *Current Psychology, 35*(3), 437-449. <https://doi.org/10.1007/s12144-015-9312-3>
- Van Parys, H., Provoost, V., De Sutter, P., Pennings, G., & Buysse, A. (2017). Multi family member interview studies: A focus on data analysis.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39*(3), 386-401. <https://doi.org/10.1111/1467-6427.12169>
- Wang, Y. H. (2010). Being a mother in a foreign land: Perspectives of immigrant wives on mothering experiences in Taiwan. *Taiwa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7*(1), 3-40. <https://doi.org/10.7039/TJSAST.201004.0003>

收件日期：109年11月25日

一審日期：110年05月12日

二審日期：110年07月23日

通過日期：110年08月08日

Studying the Parent-adolescent Interaction Experiences in a Taiwanese-Indonesian Transnational Marriage Family: A Case Study

Yi-Wei Chen

Yi-Han Wang*

Hsuang Chuang University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The educational and upbringing experiences of transnational marriages between Taiwan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have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academics and helping professions in Taiwan. As children grow up to adolescence, the parent-adolescent interaction of these families is a topic that needs to be discussed.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parent-adolescent interaction experiences in a Southeast Asian transnational marriage family in Taiwan, including upbringing, coparenting and cross-cultural experiences. This study selected one Taiwanese-Indonesian transnational marriage family as a case,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individually with all family members, including parents and adolescents.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ed: (1) Upbringing experiences: Parents had gradually changed their upbringing strategies when children grew up to adolescence—from strict disciplines to self-management. The division of parenting work "the father is responsible for family economy; the mother is in charge of care work" was the main upbringing strategy in the daily life or schoolwork. Also, as children grew up to adolescence and accepted school education, the discrepancy of Chinese speaking ability between Indonesian new resident mother and adolescents influenced their interactions. In other words, adolescents showed better Chinese speaking ability than Indonesian mother, and this difference in language proficiency not only overturned Indonesian mother's upbringing role but also affected her parenting authority, especially when quarrels appeared between mother and adolescents. (2) Coparenting experiences: Gender division of housework "male leads outside; female leads inside" was the pattern of parenting practice in this family. Indonesian mother was the main executor in parenting, but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aiwanese father and adolescents, she used her strategies positively, pulling father into parenting alliance. Also, affected unconsciously by ideology of patriarchy and thought of "the father is responsible for family economy", Indonesian

* Corresponding author: Yi-Han Wang, e-mail: evawang@cc.ncue.edu.tw
doi: 10.53106/172851862022010063001

mother intended to respect her husband in some crucial parenting decision-making, especially when it came to paying money. (3) Cross-cultural experiences: In this case, Indonesian mother had ethnic Chinese background, so all the family members felt few cross-cultural differences. But when Indonesian mother tried to teach some easy Indonesian words or sentences for her daughter and son at their very young age, it still showed parenting authority discrepancies between Taiwanese father and Indonesian mother—that was, Indonesian mother's native language was not accepted by Taiwanese father at the beginning. However, as pivotal opportunities appeared, like new resident culture courses in school, Indonesian language learning chance brought by Indonesian mother's relatives and adolescents going back to Indonesia with mother to learn Indonesian cultures through practice, Indonesian mother's native culture began to be taught in parent-adolescent interactions. Based on study results, two findings are as followed: (1) With related conditions such as co-parenting consensus, positive acts and cooperation of parents, good use of cross-cultural similarities, and acceptance of differences, it could form positive dynamic system and benefit parent-adolescent interaction in Southeast Asian transnational marriage families. (2)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gender culture and because Taiwanese father was the role of household maintenance and was familiar with local educational system, the phenomenon that new resident mother spent more time in parenting but Taiwanese father was the main decision maker and the career consultant became more obvious as children grew up to adolescence. Suggestions for counseling practices are also elaborated according to this study: (1) Counselors are suggested to give attention to how those different systems and factors bring positive influences to Taiwanese-Indonesian transnational marriage families. (2) Counselors are suggested to be sensitive to hidden power issues in Taiwanese-Indonesian transnational marriage families. (3) Related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about Southeast Asian transnational marriage families are necessary for counselors. Also, counselors are suggested to inspect their own values and take good use of family system perspectives when conceptualizing clients or families.

Keywords: Adolescent, new resident, parent-adolescent interaction experiences, Southeast Asian transnational marriage family, Taiwanese-Indonesian transnational marriage.